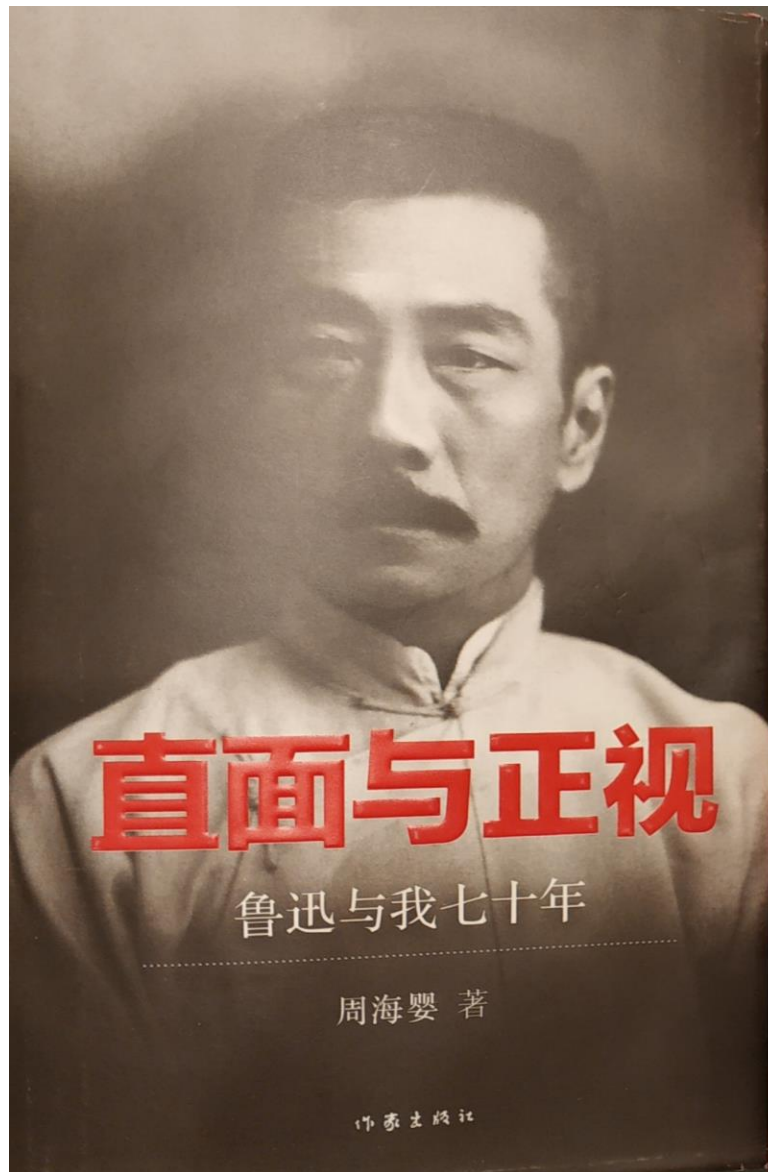




直面与正 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著

作家出版社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著



直面与正视

读书分享

这是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不为尊者讳，写了鲁迅及周氏家族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具有史料和研究价值。

这也是一本展示鲁迅如何做父亲的家庭教育之书，还原了鲁迅作为平凡人、作为父亲的样子，再现了鲁迅“无条件养育”“爱与自由”的教育理念。这更是一个男孩用尽一生追寻父亲的心路历程。

分享人：陈华

时间：2022年7月5日 晚19:30—21:00

地点：星湖街1255号 习园咖啡



直面与正视

读书分享

这是鲁迅之子周海婴撰写的一本回忆录，书中不为尊者讳，写了鲁迅及周氏家族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具有史料和研究价值。

这也是一本展示鲁迅如何做父亲的家庭教育之书，还原了鲁迅作为平凡人、作为父亲的样子，再现了鲁迅“无条件养育”“爱与自由”的教育理念。这更是一个男孩用尽一生追寻父亲的心路历程。

分享人：陈华

时间：2022年7月5日 晚19:30—21:00

地点：星湖街1255号 习园咖啡



作者 周海婴 (1929.9.27—2011.4.7)

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绍兴。无线电专家。

1952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无线电。

1960年起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副部级离休待遇），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党员。

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名誉会长。

北京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厦门鲁迅纪念馆名誉馆长。

北京鲁迅中学、绍兴鲁迅中学名誉校长。

中国鲁迅研究室、上海鲁迅纪念馆顾问。

中国无线电运动协会（CRSA）顾问（业余无线电呼号BA1CY）。

广电总局：周海婴同志病逝 遗体告别仪式4月11日举行

发布时间:2011年04月07日 14:4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广电总局网站

专题:[鲁迅之子周海婴逝世](#)

讣告

原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周海婴同志，因病于2011年4月7日凌晨5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周海婴同志1929年9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48年10月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海婴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11年4月11日11时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

周海婴同志治丧小组办公室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澄清作者的
职务身份

版本

南海出版公司2001版

文汇出版社2006年7月
(图左)

2019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图右)



目录

- 01有些性格像鲁迅顾明远
- 05追忆家父周海婴先生周令飞
- 1记忆中的父亲
- 35大陆新村九号
- 49阿花与许妈
- 55父亲的死
- 82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契
- 94建人叔叔的不幸婚姻
- 110朱安女士
- 119“不卖血”的朋友
- 134迁入霞飞坊
- 145霞飞坊邻居
- 159母亲的被捕
- 169我家的房客
- 176几位朋友
- 187母亲娘家的亲戚
- 197坚守上海
- 211胜利前后
- 230到解放区去
- 250从沈阳到北平
- 277我的学习经历
- 299镜匣人间
- 308我的婚姻
- 321母亲入党
- 336必须说明的真相
- 354鲁迅手稿事件
- 367我给毛主席写信的前前后后
- 375长子的婚姻
- 402父亲的遗产
- 418再说几句
- 420后记
- 423附录一鲁迅的忘年交
- 426附录二内山完造与鲁迅的友谊
- 430附录三从冯雪峰先生的一封信说起
- 433附录四有关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材料
- 442附录五史实说得很清楚了
- 452附录六鲁迅是谁？
- 462附录七鲁迅之死疑案

作者全家福照片



但不久，毛泽东对形势发展有了新的判断，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微妙起来。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席间罗稷南问了毛泽东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语惊四座：“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最早由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最后一节《再说几句》中披露：（毛回答说，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其后，罗稷南的侄子陈焜也发表文章说自己也曾亲耳听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对于被毛推上神坛的鲁迅，毛的这个说法确实让人感到吃惊，不过这也许是毛当时借鲁迅奉劝“右派”知识分子，不要做“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熟读鲁迅的毛泽东无疑是非常理解鲁迅的，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对共和国的成立是持欢迎态度的，因为有可能实践他的理想”（钱理群《鲁迅眼中的真实毛泽东》），但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批判怀疑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正如当时的环境一样，他也要被“限制和改造”。（对鲁迅的改造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里就提到，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只适合“黑暗的国统区”，而不适合“光明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



阅读本书的缘起：流言——谎言？真相？

《再说几句》：1957年，时值“反右”，毛泽东在上海小住时，罗谔南曾问他：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时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副部长级）、研究员陈晋发表了《罗谔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载《作品与争鸣》2004.12）《鲁迅活着会怎样？》（搜狐网转载《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从当事人的去世年龄、籍贯口音、工作单位、会议史料、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否定了毛罗这一问答的真实性：**罗谔南不可能以毛泽东的“同乡”和“湖南老友”身份参加“聊聊”；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召集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1957年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与《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述内容有根本区别。**

文中考证毛泽东确在1957年就“鲁迅活着会怎样”发表过看法——

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代表座谈时，说道：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3月10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后，毛泽东召集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说起：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以上这些都发生在“反右”前，时值中央大力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文化界处于出现短暂的活跃中。稍后，就开始了“反右”运动。（引自豆瓣、搜狐网等）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著

再说几句

回忆录写到这里，似乎应当收笔了。但有一件事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

这件事要从母亲的老朋友罗稷南先生讲起。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于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蒲石路（现长乐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悄悄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先生也是主席的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计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418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

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宁波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二〇〇一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我记得，类似的这种拟想，在“文革”初期，母亲就曾接到学生红卫兵的多封来信，也有径寄党中央的，叙述了许多的理由，要求追认并接纳鲁迅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不清楚是否也有与罗稷南先生那般脾气的人，亦把这个问题率直地提出来请示过，毛主席的回答是怎样的，那也只能留待另一位写了。

注：罗先生任职的地方，当时是委托本书编辑打听的，后核实情况不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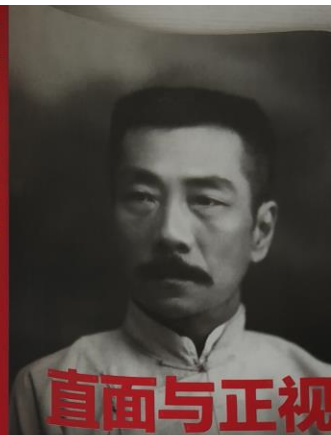
419

鲁迅
直面与正视

周海婴 著

BOOKS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著

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

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一直到罗老先生病重，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我这件事的。那是在宁波一个旅馆房间里，同时在场的另有一位老专家。由于这段对话属于“孤证”，又事关重大，我撰写之后又抽掉。幸而在今年（二〇〇一年）七月拜访了王元化先生，王先生告诉我应当可以披露，此事的公开不至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况且王元化先生告诉我：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情。

我记得，类似的这种拟想，在“文革”初期，母亲就曾接到学生红卫兵的多封来信，也有径寄党中央的，叙述了许多的理由，要求追认并接纳鲁迅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不清楚是否也有与罗稷南先生那般脾气的人，亦把这个问题率直地提出来请示过，毛主席的回答是怎样的，那也只能留待另一位写了。

注：罗先生任职的地方，当时是委托本书编辑打听的，后核实情况不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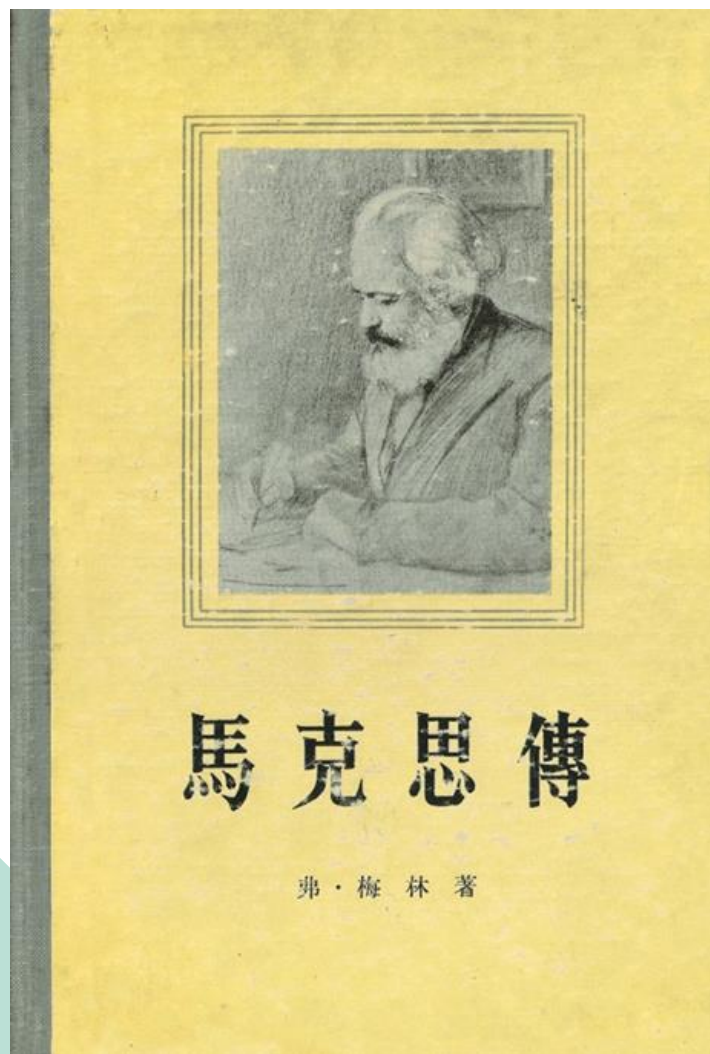
419

毛罗对话传说是 中的罗稷南是 《马克思传》 中文版首译者

资料主要来源：中共凤庆县委党史研究室 2021-11-11

罗稷南（1898-1971.8.17），作家，翻译家。原名陈强华，号小航。云南顺宁（今临沧市凤庆县）人。是明代南京移民凤庆的第11代。毕业于大理中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转中文系），精通英语、俄语。在北大历经“五四”运动锻炼，认识了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毕业后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兼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国文及英语教员。1925年秋在厦门大学任教，结识了鲁迅、王亚南（翻译《资本论》）等。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第3军第28师师部秘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十九路军军部秘书。罗稷南这一笔名来自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唐·吉珂德》中骑士唐·吉珂德的坐骑瘦马Rocinnante的中文译名。因蔡廷锴军长身高体瘦，形象酷似唐·吉珂德，作为蔡将军的部下，他愿意自己是那匹瘦弱的坐骑，以表达对将军的敬重和愿为正义事业奉献一切的决心。1933年11月，十九路军组织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因罗与共产党人有密切关系，蔡廷锴、李济深命他作为十九路军和“福建省人民政府”的代表，到江西中央苏区瑞金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向苏区提供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设宴款待。1934年1月，“福建省人民政府”被蒋推翻，转到上海，举办“现代知识讲座”，向民众传播现代知识。与黄洛峰合办《读书生活》出版社，担任经理。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沦陷，居住在上海复兴路（工作之余在上海襄阳公园下围棋，棋友有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振宁的父亲杨午之等），翻译了苏联高尔基的《幼年时代》《和列宁相处的日子》《没落》《旁观者》《燎原》，毕生翻译了20多部名著800多万字，成一代翻译大家。1942年再次被日本宪兵逮捕拘留3个月。出狱后着手《马克思传》的翻译。安排其二弟、革命烈士陈少航之子，年仅13岁的陈焜在路口煤球铺当小帮工，监视住所四周来历不明之人。1945年11月《马克思传》（上部）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是根据梅林《马克思传》英文第2版转译的首部中译本。1946年底，完整版《马克思传》（上、下两部）在上海公开出版。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和上海文化界人士亲切座谈时，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再次相遇的两位老友相谈甚欢。毛主席在交谈中还特别表扬并感谢罗稷南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5年与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郑振铎等创办《民主》周刊，12月与许广平、周建人、马叙伦、王绍鏊等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

1950年，罗稷南被党中央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未到任）。后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罗稷南蒙冤受害。70岁到远离上海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1年8月17日逝世。



毛泽东和鲁迅

作为伫立在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两个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历来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虽然两人素未谋面，但这并未影响两人之间的“神交”。鲁迅长毛泽东12岁，青年时代，毛就是鲁迅的“粉丝”。毛泽东知道鲁迅，是从阅读《新青年》开始的。鲁迅最初的一些白话小说和杂文，都发表在这本杂志上。1918年8月，25岁的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专门到鲁迅住的院子拜访，未遇。

毛泽东和鲁迅未曾谋面，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思想默契。在新文化运动几个重要人物中，鲁迅的思想轨迹同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主张颇为接近。毛泽东也频繁在著述中引用鲁迅的作品。

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评价鲁迅是在1937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应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之邀，为陕北公学学生作了一篇《论鲁迅》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毛称鲁迅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对鲁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毛泽东在延安的书桌上摆放着《鲁迅全集》。

1938年1月12日，毛泽东给当时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的艾思奇写过一封信：“我没有《鲁迅全集》，有几本零的，《朝花夕拾》也在内，遍寻都不见了。”

1938年8月，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20卷本《鲁迅全集》在上海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次出版《鲁迅全集》。通过党的地下组织，《鲁迅全集》从上海辗转送到了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得到了一套。他在中南海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套书保存下来不容易啊！当时打仗，说转移就转移，有时在转移路上还要打仗，书能保存到今天，我首先要感谢那曾为我背书的同志们。”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给予鲁迅高度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做关于文艺的报告，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在中央学习组的报告中，毛泽东又强调说：“文艺是一支军队，……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号召：“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在这篇讲话里，毛还提到，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笔法只适合“黑暗的国统区”，而不适合“光明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抗日根据地”。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各位代表都获得一枚铜像章：毛泽东和鲁迅的双人像章。

1949年12月访苏，它还带着《鲁迅全集》，以便随时阅读。

1957年3月8日，当时毛泽东正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他在《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中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又谈道：“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

附录六 鲁迅是谁？

周海婴 周令飞

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变迁不仅会固化我们的情感，而且也会加深我们对人与事的认识。对于已成往事的二十世纪，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的感慨不仅深刻，而且复杂：鲁迅在二十世纪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他以毕生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文化鲁迅”，这是我们作为鲁迅家属的骄傲；从更广的视野来看，鲁迅作为作家的意义可能还表现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努力实践着传播新文化的信念，同时，他也因为自己不惧前驱的意志而成为一面具有召唤性的旗帜，对以后那些同样致力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有为者而言，鲁迅是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导师。

然而，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关于鲁迅，似乎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些变化还在持续进行中，这些变化不仅使我们感到十分不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又越来越明显地在我们内心转化为对“文化鲁迅”的责任感了。二〇〇二年，

我们在上海成立了非企业性质的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全身心地开始了接近鲁迅的工作，我们把中心的办公地点就选择在当年鲁迅住过的上海虹口，离他的墓地走路三分钟。在四年的工作中，我们接触了与鲁迅相关的所有纪念馆，联系了与鲁迅命名的各类学校，对鲁迅故乡和他的所到之处作了大量的实地访问，此外，我们还与一些研究鲁迅的学者、专家取得了联系。在与社会大众的交流中我们获得了大量信息。当然，我们也接触了很多学生。随着工作的展开和延续，原来那些让我们不安的东西越来越沉重了。在此之前，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我们天然地拥有与鲁迅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但是现在这种联系似乎已经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切断了：我们在宣传鲁迅，纪念鲁迅这样一个垂直的系统里，并没有找到那个本应属于我们的独特位置。这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在法理上鲁迅他应该就是我们的亲人，在感情上也是我们的亲人，可是现在却感觉这个鲁迅离我们很遥远，好像几乎已经不是我们家里的人了，我们背负着鲁迅子孙的重负却几乎不能直率的表白，就是当我们把所有鲁迅遗物捐出去以后，我们从此就开始被当成了花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属很疑惑，如果这种权利也被剥夺的话，这是否符合鲁迅的原意？而一个并不符合鲁迅原意的社会还怎能做到理解鲁迅和传播鲁迅精神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想写一篇名为《我想触摸活着的鲁迅》的文章，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鲁迅能够真实地活在二十一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让他活得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能促进中国社会朝向健康文明的方向发展，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有理由有必要走下去的话，则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生活中的鲁迅其实是个爱开玩笑、非常幽默和蔼的人。从鲁迅的外貌上

来说，我们想还他的是这样一个原本的形象，说老实话，我们迫切地需要表达我们家属对鲁迅的认识。

事实上，对鲁迅的宣传和纪念始终都与对鲁迅的认识相互联系着。作为鲁迅的家属，我们对这一点尤为敏感。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关系是很密切的。因此，鲁迅与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以往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上面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形象是紧皱双眉、紧蹙严峻凝重的，思想是革命化战斗化的，没有个性和生活，其他方面似乎都淡化掉了，只剩这么一个壳，甚至在对这个壳的描述中，也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我们总觉得这样的鲁迅很空洞，我们不认识这样一个鲁迅。以后，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也把这个特别“革命化”了的鲁迅形象以知识普及的形式传播给了一代代中国人。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学语文课本里的鲁迅形象也还保留着浓厚的意识形态化的特征。这个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体现的更多的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价值，而他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则被大大地简化了。

此外，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这就是存在于中国各大高校和各研究机构里的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工作也因为历史的原因也曾一度被意识形态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出现了很多优秀的鲁迅研究者。我们对他们的工作是很尊重的，因为，他们把主要力量和智慧放在了“还原历史中的鲁迅”这样一个工作上。“还原历史中的鲁迅”之所以

是重要的，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相当一段时间里，鲁迅被严重地“革命化”和“意识形态化”了，以至于完全掩盖了历史中真实的鲁迅形象，当然也就取消了鲁迅作为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巨大的思想存在和文化价值。然而，这种还原的工作，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立场差异存在理解与认识上的歧见，因而，也就存在思想上不同见解间的论争。也就是说，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是不完全统一的，还处在一个不断还原，以趋于接近那个历史中真实的鲁迅的过程之中。

因此，我们的不安显得尤为迫切。在已经存在的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中，鲁迅的真实形象显得遥远而模糊。现在我们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根据我们的不完全调查，现在青年的一代已经开始淡忘鲁迅了，如果你去问他们“鲁迅是谁？”，他们就会说对敌人“横眉冷对千夫指”，对人民“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都是一个已经“阶级斗争化”了的鲁迅，一个除了用“战士”这个名词来说明以外就找不到词汇来说明的鲁迅。鲁迅在二十世纪所做的工作及其对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意义，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有这些都令我们十分不安和迷惑，因此，如何让鲁迅活在二十一世纪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首先在于回答“鲁迅是谁”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鲁迅是谁呢？

此文 中引 《呐喊自序》， 标点 严重 有误， 误导 读者。 恶意？

二

寻求对鲁迅的理解，找寻“鲁迅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关键在于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如果说，“意识形态化的鲁迅”是追求对鲁迅的政治实用的价值的话，那么，“还原历史中的鲁迅”则是在追求对鲁迅的认识价值，而我们所说的要对鲁迅的人格和精神做出概括，则是在追求鲁迅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我们想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谈谈我们个人对父亲和祖父的认识。

首先是立人为本的思想。

“立人为本”是鲁迅精神的灵魂。实际上，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自觉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工作上去。国家遭受凌辱的历史困境曾使鲁迅十分痛心，这激发了他对人的精神麻木，尤其是中国人的精神麻木的自觉而深入的关注。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无意间看到影像中麻木的中国人，这件事对鲁迅刺痛最深，他在《呐喊自序》里写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只有当具有个体尊严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被确立起来，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才是可能的。”鲁迅在这里讲到的个体尊严和个体意识的觉醒就是他“立人为本”思想的精髓。

鲁迅讲的个体尊严，代表着现代人的价值理念，这种观念表

明每个个体都有充分发展自我、享受幸福的权力，同时，他也完全拥有个人独立思考的权力，这是每个人的天赋人权。人不应该为自己的独立思考遭受损害，这是一种普世价值理念。而个体意识的觉醒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的生存价值的关注与自觉。拥有这种个体意识的人会自觉地要求自己活出一个样子出来，他会活得很有尊严，也很有魅力，所以，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意识，他就具有了真正的勇气，他就可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他也可以拥有“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样一种坦荡的胸怀了。所以，个体意识着重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以及人的精神气度的养成。

拥有了个体尊严和个体生命的自觉意识，也就拥有了鲁迅所说的“自信力”。而这些拥有自信力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以，鲁迅接着指出：“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觉醒人的个体尊严，激活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这是鲁迅人格与精神的首要之点，具有个体尊严和清醒的个体意识是他特别看重的精神品质。

其次是独立思考。

如果“说立人为本”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灵魂的话，那么，独立思考则是他的骨髓，它使“立人为本”这个灵魂获得了支撑。

仔细思考鲁迅的独立思考的内容，大概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一）独立思考体现为一个人如何把“立人为本”的理念真正落实在自己的身上。这种独立思考要求一个个体自觉的人对自己的生命负有完整的责任。在五四新文化时代，像鲁迅这样的早期思想启蒙者特别看重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负责态度。我要过怎样的生活不应该让父母来包办，也不应该由某个外在的绝对权威来支配，我有我自己的选择，这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东西。它真正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我这样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才是有意义的，对这样的问题，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是有着明确坚定的立场的；

（二）真正的独立思考意味着能够把批判精神体现出来。鲁迅在《野草》中描写了一个举起投枪的战士，这个战士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自我形象。这就是说，鲁迅是自觉地把批判的重担放在了自己身上的。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斗士。这里，批判的意思是一个人有勇气面对真实的世界，并且不依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鲁迅就是一个具有这种批判精神的斗士。值得特别强调的是，鲁迅的这种批判目的不是破坏、拆毁和颠覆，而是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他的建设性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说，鲁迅对孙中山推翻千年帝制、亲手创建的新制是有感情的，是希望他成长壮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希望和期待，他才对那些丑恶的、腐败的、麻木的、落后的现象怀抱如此深刻的愤怒。但在这愤怒后面难道不是跳动着一颗希望的心吗？所以，我们说鲁迅是一个为新文化理念去战斗的人。当他看到一切阻碍着新文化传播的力量时，他是以合法的、和平的方式来捍卫新文化的，虽然有时候他使用

讽刺与挖苦的笔调，但这仅仅是他的一种个人风格，是无可厚非的。

（三）独立思考也意味着文化与观念的创新精神。在拥有深厚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努力传播新文化的理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创新。是需要用勇气来实践的一项人类壮举。鲁迅首先是思想家。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的。鲁迅强调在思想与文化观念上的创新，是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创新。同时，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也必须依赖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思想和文化创新的意思。所以，文化和观念的创新既是基础性的创新，同时也是主导性的创新。

第三是拿来主义。

鲁迅是一个在文化上积极主张拿来的思想家。拿来主义就好像是鲁迅精神与人格的眼睛，体现的是他的气度、视野和眼光。他在《拿来主义》一文中这样写：“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这“送来”的历史就是被迫、屈辱的历史。何以打破这被迫和屈辱呢？那么，就首先需要去拿来。所以他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拿来主义体现的是文化的气度、视野与眼光。他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立场是完全中国的。他是脚踩在中国的大地而放眼世界的，

一切拿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我们自身的自强和壮大。所以，他与崇洋媚外是势不两立的，也不赞同无选择的乱拿。

第四是韧性的坚守。

韧性的坚守是鲁迅精神的手和足，它是对上述三个方面积极而坚持不懈的践履，是观念落实在行为上的具体过程，是一步步走、一点点做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和进取。所以，鲁迅的韧性，体现的是一种坚守的精神。它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长度，二是强度。所谓长度，就是指每天的工作从不懈怠，所谓强度，就是指每日工作的辛劳与效能。鲁迅在他的《野草》中有这样的句子：“是的，我只得走了。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可恨的是我的脚早经走破了，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那“前面的声音”其实也就是他自己内心的声音，这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持之以恒，进之以猛，把坚守贯穿于生命的整个历程，一个人能够拥有这样的人生，就足以令自己欣慰的了。所以，我们理解的鲁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他弥留之际，没有什么悲哀痛苦的，因为在他的一生中他尽可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而且做得那么好，鲁迅在自我完成方面是足够欣慰的。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把自己做成，这是多么精彩，他怎么会感到悲哀呢？所以，最近在筹拍40集鲁迅电视剧，我就对编剧们说，不要把鲁迅的弥留之际描写得很悲哀，他应该是豪情满怀的。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看出，要做到韧性的坚守，就要面对三个东西：暴力、权力和软暴力，应该说，鲁迅对来自这三个方面的压力是做好了足够的精神准备的，所以，他从来没有被暴力和权力屈服过。更没有被软暴力所腐化和动摇。尤其是软暴力，

更有当今的现实意义。要知道，鲁迅当年的生活是很精致的，他当年的生活大概仍然是今天很多人追求的梦想，但是鲁迅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拥有这样的生活就遗忘了自己对社会的使命，他对自己的使命和自我完成是充分自觉的。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拜金主义思想很严重，对青年一代影响很坏，一个孩子在家里总是养尊处优，害怕困难，遇到一点点挫折就受不了，这很成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软暴力处处显示威力的时代，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使每个生命个体发育成型，拥有健全的个体生命自觉，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以上我们谈了我们的不安和迷惑，谈了鲁迅的精神和人格，这是在沉思良久后，我们鲁迅的第二、三代鼓起勇气，在鲁迅走后七十年来第一次说出我们的想法，发出我们的声音。第一次表达我们作为鲁迅的儿子和孙子对父亲和祖父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希望能够促进社会各界传播和弘扬鲁迅精神，并且让这样一种鲁迅精神真正地活进二十一世纪，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工作。但我们绝不是把鲁迅作为我们个人的事情来做的，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事业来追求，中国的未来需要鲁迅，需要这样的文化精神。因为他已经是一种经过一个世纪大浪淘沙所产生的中华民族现代的文化精神和脊梁的象征。我们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参与。我们在二〇〇六年策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以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年。对这样一个社会性的事业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提议将二〇〇六年作为“普及鲁迅元年”，希望以此作为新的起点，把这一工作持续、有效、深入地开展下去。

附录七 鲁迅之死疑案

周海婴

引语

老年人往往话多，不仅话多而且还喜欢唠叨，所以只要有条件，撰写回忆录的往往大有其人，我亦未能免俗，也于六年前写成出版了一本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

自从我的这本书出版后，颇有一些社会反响。有赞许的，也有异议的；有同意我书中所阐述的事实和观点的，也有不理解的。所有这些，我都不大措意，因为我写书之本意只是想把我的所历、所知、所思，如实地说出来，至于别人如何看，如何想，那是别人的事，我都不在意，更不会因此而妄生悲喜，所以也就没有写过什么“反响之反响”之类的文章。多年积蕴，一吐而快，本来以为可以言尽于此，不必再来饶舌了，但有些问题，比如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的病和死以及须藤医生在其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仍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久久不能释怀。这个问题我在回忆录中曾经写过一节，但我仍然时时有想继续说话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做儿

子的固执或多疑，更是出于一种责任。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种疑惑尽可能完整地讲出来，以等待将来真相大白的一天，即使一时不能还原于历史的本来面目，也要把它留下来作为后人考证之用。

鲁迅完全有可能活到六十多岁

我们一直怀疑给父亲看病的须藤医生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须藤医生全名须藤五百三，一八九八年毕业于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曾任陆军三等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后在日本国内善通寺预备病院和姬路卫戍病院等处工作，还以军医身份任朝鲜总督府黄海道（海州）慈惠医院院长。一九一八年退伍。以后又来上海开设“须藤医院”（一九二六年《上海年鉴》上已有须藤医院名录）。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三十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

须藤医生进入我家与我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哮喘病更是久治不愈，别的医生开的药控制不住。一九三三年三月，内山先生便推荐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内山书店的医疗顾问须藤先生接替坪井学士为我看病，顺乎自然地也给父亲看病，时间长达三年半，看病总的次数在一百五十次以上。父亲认识他似乎更早，因为一九三二年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写信给须藤先生的记载。以后父亲还为他买过几本书，互相之间馈赠过礼品，请过饭，这就超出一般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了。因此须藤医生对他的病人（我父亲）了解不可谓之不深。那时父亲肺结核的症状已相当明显，据专家说，即使是一个实习医生也很

但是其后，毛对鲁迅的评价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越来越高。1958年12月1日，被毛主席誉为“劳动人民的红线女”的著名粤剧演员邝健康，在武昌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代表演出。她请求毛泽东题词，毛泽东当晚欣然挥毫写了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毛泽东鲜有地引用他人文字题词，表达了他对鲁迅和所有为人民服务的人最高的致敬。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体现了对鲁迅的理解之深，他说：“鲁迅的战斗方法很值得学习。”“鲁迅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的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落文。”

1966年3月18日，在杭州的一个小型会议上，有人谈到某外国元首攻击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则说：“写一篇老而不死论。鲁迅写过。许多人围攻他，他就是不屈服，从来没有屈服。他又没有我们这么多人开会。你们有工夫，最好把鲁迅的著作看看，看他那时候的形势，看他的作战方法。”7月8日，在武汉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1971年，毛泽东大病一场，“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依然天天躺在床上坚持读鲁迅著作和各种书籍”。

1971年11月在武汉的谈话中，毛进一步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还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

在逝世前半年多，指示：我建议，在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1976年9月逝世前夕，在卧室的床上、桌子上、书架上，摆着大字本的《鲁迅全集》，有的折了一角，有的夹着纸条，有的翻开放着的。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往往会“搬出”鲁迅，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他反复谈到的人物。毛泽东阅读《鲁迅全集》非常认真仔细。从他在书上批划的情形来看，凡是原书中文字排印颠倒、错字漏字的地方，他都把它们一一改正过来。例如，他看到《鲁迅全集》第四卷里，鲁迅引用张泌《浣溪沙》，其中有：“消息未通何计从”一句，毛泽东读到这里时，认为从音韵来看，“从”字应改为“是”字。中华书局出版的《全唐诗》卷八百九十八显示，原词确实是“是”字，而不是“从”字。1981年新版《鲁迅全集》据此作了改正。

鲁迅全家与冯雪峰全家合影，1931-4-20，上海。



“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作家范泉在其主编的《文艺春秋》月刊上推出一个纪念特辑，以“要是鲁迅先生还活着”为题，邀请15位知识分子笔谈。茅盾、田汉、施蛰存、臧克家、萧乾等人纷纷提笔，所答均紧扣当年6月内战全面引爆之时局，好几位作家谈到李公朴、闻一多的遇刺，郭沫若、马叙伦的挨打，认为鲁迅如果活着，也难逃厄运。

而更为人们所关注的，则是如果新中国成立后，鲁迅还活着，他会怎样？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鲁迅和毛泽东对此都有一些相关言论。

如前所言，鲁迅对毛泽东及其著作的了解其实很有限，但是作为一个敏锐的时代观察者，鲁迅对其非常关注的共产党及其所进行的革命如果胜利后自己的处境，还是有些思考的。他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预测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旧社会崩溃，新社会来临，鲁迅预测他要穿着红背心在上海扫马路。

• 作者临终前的忧虑：文化复辟

(见序二《追忆家父周海婴先生》周令飞)

- 孔子像为何只在天安门广场待了100天？
- 来源: 济南时报2011-04-25
- 100多天前的2011年1月11日，悄无声息地，他竖立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北门广场内。
- 这是一尊身高7.9米、基座1.6米，由17吨青铜铸造成的雕像，是成为继毛泽东、孙中山之后第三位进驻这一区域的历史人物。他西邻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他北望天安门城楼，与高悬的毛主席画像相互可视。他在这一地理位置上的出现，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整整100天后，2011年4月20日，他离开了国博北广场，依然悄无声息。
- 国博人员告诉记者，其实，这里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天安门广场区域。但一些生活在天安门广场周边的“老北京”，将孔子像之前所在的位置，习惯性地视为天安门广场范围之内，因而国博北门广场这一原本普通的地理位置，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地位”。
- 国博院内。在西北角“U”形建筑下方的露天空地上，孔子像静静地伫立在那里。
- 2010年3月，国博馆长吕章申找到现为全国城市雕塑委员会副主任的雕塑家吴为山，请他创作一尊孔子像安放在国博北门广场。他认为，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有一尊孔子像，与国家博物馆的地位、文化象征是相配的。2010年底，孔子像完成。



作者从10岁起拿起相机摄影





马克·吐温

当你不知道某句话是谁说的
就说是马克·吐温说的



我没说过这句话
——鲁迅

鲁迅

说谁说的都行
别说是我说的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



“海婴与鲁迅
一岁与五十”
1930-9-25于
上海

1933-5-1

上海

许广平最喜欢这
张照片



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孤高的灵魂。去世的时候只有七十几斤，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经济遗产，却有很多人去研究他，这就说明他的心灵的历史最能够概括现代中国的历史，找不出另外一个人有我们所讲的复杂性。

——许子东（岭南大学教授，上海人，祖籍天台）

鲁迅五十岁生日全家合影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位作家，他存在的永久性几乎与任何一个“捍卫者”都无关。也可以这么说：无论喜欢他的人还是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有永远令人捉摸不透的独特的思想。这个思想与整个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和出路相关，他的思想甚至超越了一个民族自身的范围，他就是中华的“民族魂”——鲁迅。

我们曾学过鲁迅的哪些小说？

1904年2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旧称满洲）发动日俄战争（1904.2.8-1905.9.5）。申请到仙台学医。此前是东京弘文学院学生，再之前是大清江南官立陆师学堂附属矿务铁路学堂毕业生。派他以官费东渡日本的，是江南督练公所，即清廷为督练新军而在各省新设的军事当局。也就是说，他是从当地的军校毕业以后，以准军人的身份被派到日本游学的。

“弘文”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专为大清留学生创办的一所速成语言学校，学期两年。鲁迅1923年8月21日发表的《〈呐喊〉自序》中说，他选择学习西医的动机，是为了“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还为了“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他认为，年仅37岁而死的父亲的病是被中医耽误的，而未来做个军医，则显然与1904年6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旧称满洲）发动的日俄战争有直接的关系。学西医更深一层的原因，是他“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源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他没像其他同学一样留在东京，而是一个人申请到日本东北的仙台就读医学，选择了“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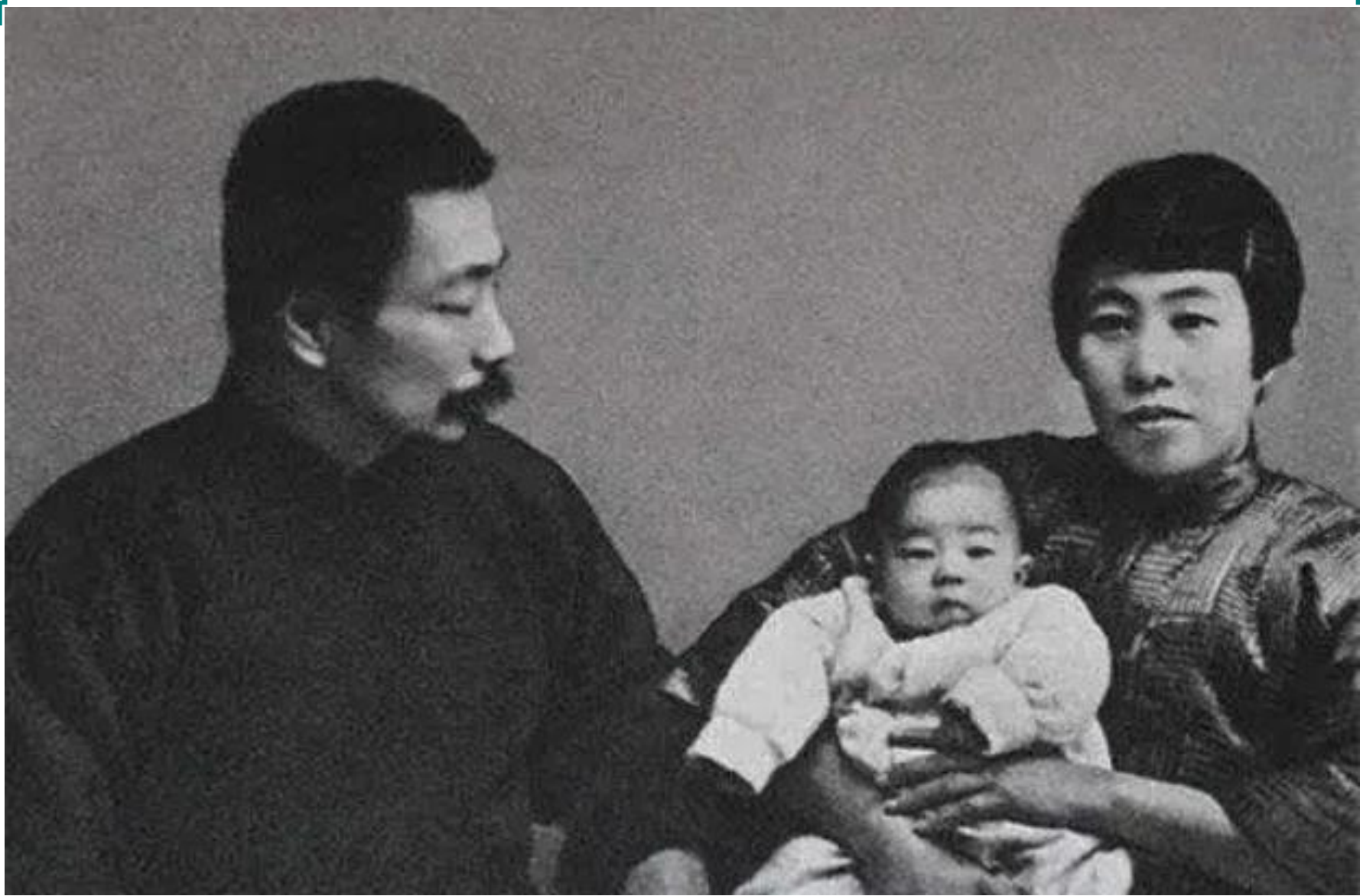
鲁迅1904年4月从东京弘文学院毕业，5月20日，大清驻日大臣杨枢亲笔为大清国人周树人给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校长山形仲艺写了推荐信，证明鲁迅是毕业于东京弘文学院的大清江南官立江南陆师学堂普通科的学生。

周作人《知堂回忆录》中有一篇《蒋抑卮》，回忆了1909年他和哥哥鲁迅在东京一起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得到蒋抑卮支持的事，说蒋抑卮“凡遇见稍有窒碍的事，常说只要拨伊铜钿，就行了吧”，于是鲁迅给他起了个绰号“**拨伊铜钿**（绍兴方言：给他钱）”。蒋抑卮慷慨豪爽，得知鲁迅兄弟俩翻译小说无钱出版，马上垫借了150元，并把自己的绸缎庄作为《域外小说集》一、二集的国内代销处。四五年后，广兴隆失火，一、二集仅各售出20册，其余则被付之一炬了，蒋抑卮垫借的资金烟消云散。能随使用钱摆平事情，是要有家底做底气的。**马一浮**曾说以丝绸起家的蒋氏发家史“制特精丽，行货遍江海，北尽辽沈，南至湖广。五十余年，积货累数百万。于是杭人言富者，推蒋广昌（蒋家的绸庄叫蒋广昌绸庄）”，号称“蒋半城”，意为资产可以买下半个杭州城。“半城的资产”传到蒋抑卮手上，这个出国留学过的新派年轻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只是嘎吱嘎吱地织绸卖布了。1905年浙江铁路公司修建**沪杭铁路**，路权要从英美两国手中赎买回来，向社会筹款，到1907年10月集资达2300万元，成立**浙江兴业银行**，蒋抑卮是最大的股东。1918年到1927年间存款五度居全国各大银行榜首。1934年向国民政府建议修筑**钱塘江大桥**，邀请中国、浙江实业等银行组成建桥银团，共同投资200万元，由茅以升主持，1937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现代公铁路两用桥。

1922年5月
23日于北京
世界语学会。
前排左起：
王玄、吴空
超、周作人、
张禅林、爱
罗先珂、鲁
迅、
Sofoklof、
李世璋。后
排左起：谢
凤举、吕传
周、罗东杰、
潘明诚、胡
企明、陈昆
三、陈声树、
冯省三。







一九三〇年一月四日于上海

自嘲 鲁迅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交了不好的运气我又能怎么办呢？想摆脱却被碰得头破血流。破帽遮脸穿过热闹的集市，像用漏船载酒驶于水中一样危险。横眉怒对那些丧尽天良、千夫所指的人，俯下身子甘愿为老百姓做孺子牛。坚守自己的志向和立场永不改变，不管外面的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

华盖：盖在头上的花一般的云气。鲁迅《华盖集·题记》：“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破帽：原作“旧帽”。漏船载酒：《晋书·毕卓传》：“得酒满数百斛（hú）……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漏船：原作“破船”。中流：河中。横眉：怒目而视的样子，表示愤恨和轻蔑。千夫指：众人的谴责。《汉书·王嘉传》：“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此处强调人言之危。孺子牛：孩子的牛。

《左传·哀公六年》：“齐景公卒，命立其子荼。陈僖子召公子阳生于鲁立之。鲍子曰：‘汝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而背之也！’”春秋时齐景公跟儿子嬉戏，装牛趴在地上，让儿子骑在背上。这里比喻为人民大众服务，更指小孩子，鲁迅把希望寄托在小孩子身上，就是未来的希望。成一统：躲进小楼，有个一统的小天下。管他冬夏与春秋：即不管外在的气候、环境有怎样的变化。


本诗是鲁迅于1932年10月12日写给柳亚子的，诗后题跋云：“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亚子先生教正。”《鲁迅日记》与此稍异：“破”作“旧”，“漏”作“破”。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写扇面时也曾写了本诗，其中“对”作“看”，后收入《集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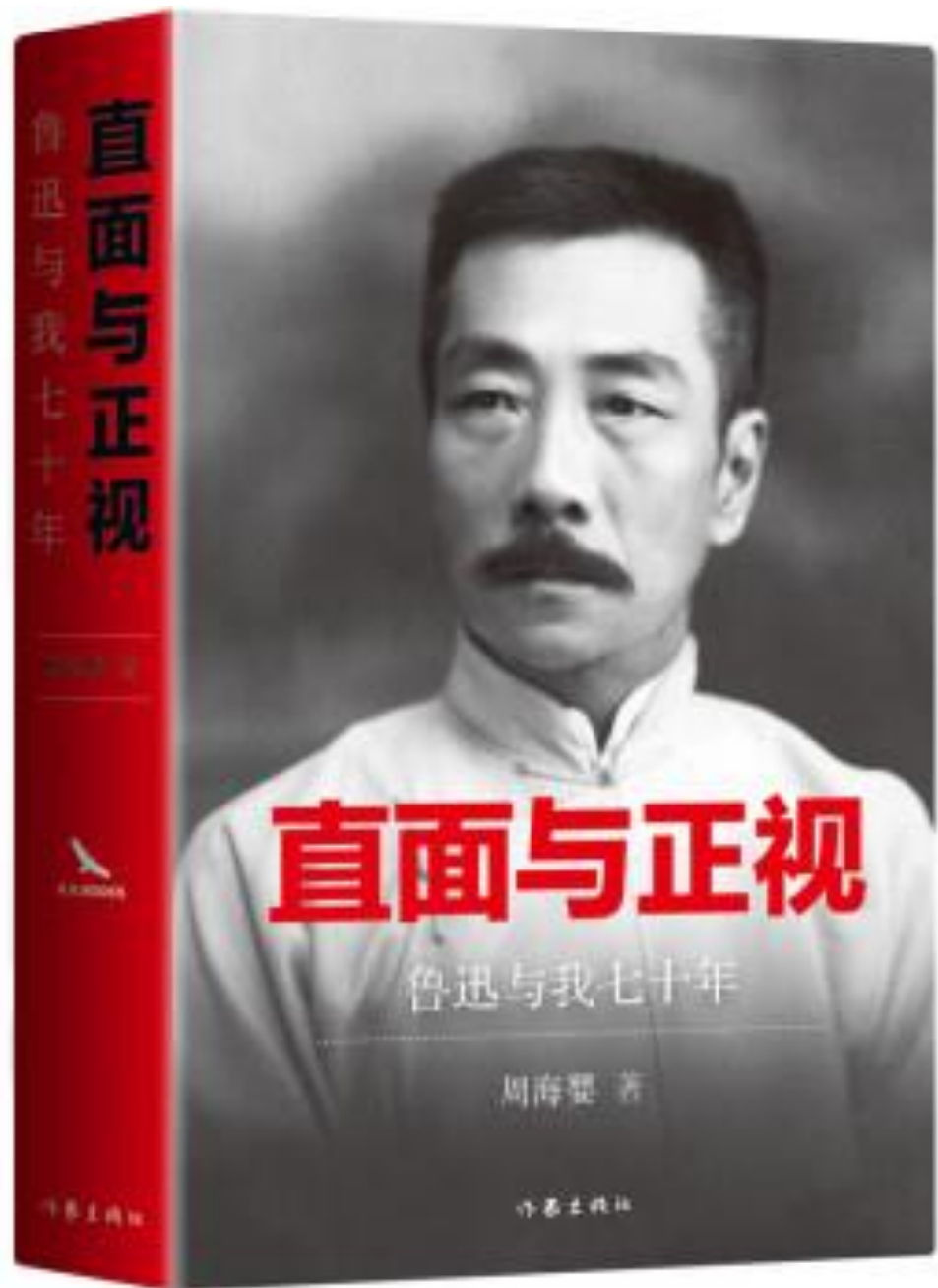
学鲁迅扮酷







不管是不是我说的
你们开心就好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直面与正视

鲁迅与我七十年

周海婴 著

作家出版社



绽放一瞬的精彩

我时常会告诉自己，虽然在最低的位置，看不到花朵绽放时的艳丽，然而却不会错过花瓣飘落时在风中悠扬飞舞的浪漫。——几米

